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1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

王 青,刘亚男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基于2009—2019年30省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东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其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区域间差距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地区差距;共同富裕;有效治理

**中图分类号:** F3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2)02-0098-12

## 一、引言

长期以来,受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村和城市发展严重不均衡。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典型的城市化偏向,城市集聚了多方面的资源,导致乡村逐渐走向衰落。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成为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近几年来逐渐被国内学者关注起来。学者们从乡村振兴的内涵、测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以“20字方针”为出发点去分析和解读[1-2]。他们认为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生态宜居是经济生态关系的协调程度,乡风文明体现了乡村建设的灵魂,治理有效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生活富裕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关于乡村振兴的测度评价,大部分学者依据“20字方针”来构建5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只是在二级指标的选择方面因人而异[3-8]。有的学者从“20字方针”的某几个方面入手构建指标体系[9-10]。还有的学者结合自己对乡村振兴的内涵理解来构建指标体系,例如李刚等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5个方面来构建38个具体指标的体系,利用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青海省乡村振兴水平,并对障碍因子进行分析[11]。关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认为主要包括政府[12]、精英[13]、基层党组织[14]、其他主体等主体因素[15]和土地[16-18]、信息科技[19-22]、制

**收稿日期:** 2021-12-08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2.02.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53)

**作者简介:** 王 青(1964—),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统计方法与宏观计量分析。E-mail:575808990@qq.com

度供给[23-24]、社会资本[25-27]、乡村教育[28-29]等客体因素。

上述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多数研究集中对乡村振兴理论方面进行探讨，关于实证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已有的实证研究多为乡村振兴测度评价或某一影响因素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检验，缺少对乡村振兴时空特征的考察。二是已有研究多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常见的主观或客观赋权方法，对某一局部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评价。研究对象以单一省份或局部区域居多，考察期间多为某一时点或三五年。缺少从全国的全局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更没有学者对全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进行系统考察。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深化研究视角，从全国的角度出发，科学考察中国乡村振兴的地区差距以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方法上选择 Dagum 基尼系数和 Kernel 核密度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 Dagum 基尼系数法可以准确刻画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并将其差距来源进行分解。通过非参数 Kernel 核密度估计准确反映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期限选择为 2009—2019 年，能够较好地反映较长的一段期间内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

## 二、研究设计

### （一）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本文也选择从这 20 字方针的 5 个方面来构建指标体系界定乡村振兴水平。本文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这 5 个方面，他们是层层递进、密不可分的。产业兴旺是发展现代农业最主要的内容，它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这一维度反映了产业、技术、制度、组织与管理创新。生态宜居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保证。它反映了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是否践行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它反映了提升乡村人口基本素质、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等文化与文明多方面的进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它反映了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完善程度，是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体现。生活富裕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根本目标。它反映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情况，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本文根据各维度的内涵，选择具体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　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单位 | 指标属性 |
|---|---|---|---|
| 产业兴旺 | 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 千瓦/公顷 | 正向 |
| | 亩均粮食总产量 | 吨/公顷 | 正向 |
| |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万元 | 正向 |
| | 作物多元化 | % | 正向 |
| | 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 % | 正向 |
| 生态宜居 | 无害化厕所普及率 | % | 正向 |
| | 绿化覆盖率 | % | 正向 |
| | 社会用电强度 | 千瓦时/万元 | 负向 |
| | 化肥使用强度 | 吨/公顷 | 负向 |

续表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单位 | 指标属性 |
|---|---|---|---|
| 乡风文明 | 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 | 正向 |
| |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 正向 |
| | 广播节目覆盖率 | % | 正向 |
| | 电视节目覆盖率 | % | 正向 |
| 治理有效 |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 % | 正向 |
| | 农村人口老龄化 | % | 负向 |
| | 每万人设有村镇建设管理机构的个数 | 个 | 正向 |
| 生活富裕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正向 |
| | 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所占比重 | % | 负向 |
| | 农村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1 | 正向 |
| |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正向 |

### （二）研究方法

1. 熵权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对乡村振兴系统各子指标进行赋权，将其整合得到一个综合指标，以此来衡量中国30省乡村振兴水平。这种方法优点在于通过指标之间信息量的变异程度进行客观赋权，可以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结果更加合理。

具体计算如下：

第一步，将各测度指标 $X_{ij}$ 作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不同的影响。

正向指标：$$Y_{ij}=\frac{X_{ij}-min(X_i)}{max(X_i)-min(X_i)} \tag{1}$$

负向指标：$$Y_{ij}=\frac{max(X_i)-X_{ij}}{max(X_i)-min(X_i)} \tag{2}$$

其中，$i$ 表示省份，$j$ 表示测度指标；$X_{ij}$ 和 $Y_{ij}$ 分别表示原始的和标准化后的测度指标值。

第二步，计算测度体系中各指标 $Y_{ij}$ 的信息熵 $E_j$。

$$E_j=\ln\frac{1}{n}\sum\nolimits_{(i=1)}^{n}\left[\left(Y_{ij}/\sum\nolimits_{(i=1)}^{n}Y_{ij}\ln\left(Y_{ij}/\sum\nolimits_{(i=1)}^{n}Y_{ij}\right)\right)\right] \tag{3}$$

第三步，计算测度体系中各测度指标 $Y_{ij}$ 的权重 $W_j$。

$$W_j=(1-E_j)/\sum\nolimits_{i=1}^{m}(1-E_j) \tag{4}$$

第四步，计算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 $y_{ji}$。

$$y_{ji}=W_j\times Y_{ij} \tag{5}$$

2. Dagum 基尼系数法

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30]，总体 Dagum 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frac{\sum\nolimits_{(j=1)}^{k}\sum\nolimits_{(h=1)}^{k}\sum\nolimits_{(r=1)}^{n_h}|y_{ji}-y_{hr}|}{2n^2\mu} \tag{6}$$

其中 $k=3$，代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空间个数。$n=30$，这里代表所有省份个数。$y_{ji}(y_{hr})$ 表示地区 $j(h)$ 内省份 $i(r)$ 的乡村振兴水平。$\mu$ 表示所有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的平均值。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乡村振兴水平地区差距越大。

地区 j 的基尼系数 $G_{jj}$ 可表示为:$G_{jj} = \frac{\sum_{i=1}^{n_j}\sum_{r=1}^{n_j} | y_{ji} - y_{hr} |}{2n_j^2\mu_j}$ (7)

地区 $j$ 和地区 $h$ 的基尼系数 $G_{jh}$可表示为:

$$G_{jh} = \frac{\sum_{i=1}^{n_j}\sum_{r=1}^{n_j} | y_{ji} - y_{hr} |}{n_j n_h(\mu_j + \mu_h)} \quad (8)$$

$n_j(n_h)$表示地区 $j(h)$内省份的个数,$\mu_j(\mu_h)$表示地区 $j(h)$内的乡村振兴水平。

下面定义如下变量:

$$p_j = n_{j/n} \quad (9)$$

$$s_j = n_j \mu_{j/n\mu} \quad (10)$$

$$d_{jh} = \int_0^{\infty} dF_j(y) \int_0^{y} (y - x) F_h(x) \quad (11)$$

$$p_{jh} = \int_0^{\infty} dF_h(y) \int_0^{y} (y - x) F_j(x) \quad (12)$$

$$D_{jh} = \frac{d_{jh} - p_{jh}}{d_{jh} + p_{jh}} \quad (13)$$

$d_{jh}$指的是地区之间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值,即 $y_{ji} - y_{hr} > 0$ 的数学期望。$p_{jh}$指的是地区之间乡村振兴水平的差值,即 $y_{ji} - y_{hr} < 0$ 的数学期望。$D_{jh}$则衡量的是 $j$ 和 $h$ 之间乡村振兴水平的相互影响。函数 F 是地区的乡村振兴累积密度函数。

区域内差距 $G_w$、区域间差距 $G_b$ 和超变密度 $G_t$ 则分别表示为:

$$G_w = \sum_{j=1}^{k} G_{jj} p_j s_j \quad (14)$$

$$G_b = \sum_{j=2}^{k}\sum_{h=1}^{j-1} G_{jh} D_{jh}(p_j s_h + p_h s_j) \quad (15)$$

$$G_t = \sum_{j=2}^{k}\sum_{h=1}^{j-1} G_{jh}(1 - D_{jh})(p_j s_h + p_h s_j) \quad (16)$$

3. Kernel 核密度估计

本文采用 Kernel 核密度估计来对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分布形态、变化趋势及延展性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Kernel 密度估计由于事先不需要设定具体模型的天然优越性,在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它主要通过连续的密度函数曲线来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假设 $x_1$、$x_2$……$x_n$ 为来自连续总体 $X$ 的样本。在任一点 $x$ 处的总体密度函数为 $f(x)$的核密度估计可以定义为:

$$\hat{f}_h(x) = \frac{1}{nh}\sum_{i=1}^{n} K(\frac{x - x_i}{h} \quad (17)$$

其中其中 $K(\cdot)$成为核函数,$h$ 为带宽,$n$ 表示观测值的个数。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等。研究期间为 2009—2019 年,截面单元为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于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同时本文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数值转变为 2009 年可比价格进行比较。

## 三、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中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进行赋权,本文测度出 2009—2019 年中国 30 省乡村振兴水平,具体见表 2。

表2 200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

| 年份 | 乡村振兴 | 产业兴旺 | 生态宜居 | 乡风文明 | 治理有效 | 生活富裕 |
|---|---|---|---|---|---|---|
| 2009 | 0.4099 | 0.0807 | 0.0717 | 0.0971 | 0.0783 | 0.0821 |
| 2010 | 0.4246 | 0.0842 | 0.0805 | 0.0973 | 0.0777 | 0.0850 |
| 2011 | 0.4377 | 0.0919 | 0.0849 | 0.0914 | 0.0806 | 0.0888 |
| 2012 | 0.4530 | 0.0961 | 0.0852 | 0.0947 | 0.0851 | 0.0918 |
| 2013 | 0.4554 | 0.0983 | 0.0927 | 0.0939 | 0.0712 | 0.0992 |
| 2014 | 0.5183 | 0.1032 | 0.0939 | 0.1262 | 0.0859 | 0.1091 |
| 2015 | 0.5312 | 0.1049 | 0.0973 | 0.1331 | 0.0827 | 0.1132 |
| 2016 | 0.5370 | 0.1047 | 0.0964 | 0.1367 | 0.0845 | 0.1148 |
| 2017 | 0.5481 | 0.1072 | 0.0986 | 0.1395 | 0.0839 | 0.1190 |
| 2018 | 0.5488 | 0.1093 | 0.1000 | 0.0840 | 0.0840 | 0.1151 |
| 2019 | 0.5552 | 0.1119 | 0.0978 | 0.0817 | 0.0817 | 0.1202 |

注：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及各系统水平为全国30省份的平均值；囿于篇幅原因，各省份的测度结果未单独列出。

### （一）乡村振兴总体水平不断提升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振兴水平从2009年的0.4099上升至2019年的0.5552，年均增幅3.08%。说明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与中国近年来不断推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5601），但增幅最小（年均增幅1.77%）。中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4839），增幅居中（年均增幅2.93%）。西部地区均值水平最低（0.4316），但增幅最大（年均增幅5.04%）。这间接反映出国家近年来在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方面做出的战略调整。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北京（0.6697）、海南（0.6058）、江苏（0.6023），均为东部省份。东部地区由于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情况较好，同时由于区域整体经济相对发达，也为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后三位分别是四川（0.4002）、贵州（0.3876）、青海（0.3871），均为西部省份。主要是由于上述省份地处西部落后地区，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导致区域整体的乡村振兴水平也不高。

### （二）产业兴旺水平显著增强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的产业兴旺水平从2009年的0.0807上升至2019年的0.1119，年均增幅3.33%。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1152），增幅最小（年均增幅2.14%）。中部地区均值水平最低（0.0890），增幅居中（年均增幅3.05%）。西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961），增幅最大（年均增幅4.34%）。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产业兴旺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海南（0.1276）、福建（0.1264）、北京（0.1258），均为东部省份。海南和福建都属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对其乡村的产业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北京由于是首都，享受很多政策红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带动了区域的乡村产业发展。后三位分别是甘肃（0.0770）、山西（0.0711）、吉林（0.0662）。

### （三）生态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的生态宜居水平从2009年的0.0717上升至2019年的0.0978，年均增幅3.15%。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1258），增幅最小（年均增幅1.10%）。中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1007），增幅居中（年均增幅3.94%）。西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652），增幅最大（年均增幅4.88%）。从各省的情况来看，生态宜居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上海（0.1783）、北京（0.1570）、江苏（0.1459），均为东部省份。这些地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更加注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注重生态友好方面的建设。同时其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也受经济

影响更加完备。后三位分别是内蒙古(0.0545)、云南(0.0494)、陕西(0.0433)。

**(四)乡风文明水平有所降低**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的乡风文明水平从2009年的0.0971下降至2019年的0.0817,年均降幅1.71%。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1221),降幅居中(年均降幅3.41%)。中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1126),降幅最大(年均降幅3.73%)。西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946),年均增幅1.21%。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乡风文明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江苏(0.1371)、黑龙江(0.1348)、北京(0.1311)。后三位分别是新疆(0.0780)、四川(0.0757)、青海(0.0718)。

**(五)治理有效水平稳中有升**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的治理有效文明水平从2009年的0.0783上升至2019年的0.0817,年均增幅1.17%。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1010),增幅居中(年均增幅1.37%)。中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831),增幅最大(年均增幅1.66%)。西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763),年均增幅2.22%。从各省的情况来看,治理有效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海南(0.1545)、北京(0.1204)、重庆(0.1021)。后三位分别是安徽(0.0619)、湖南(0.0619)、江苏(0.0586)。

**(六)生活富裕水平大幅提升**

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的生活富裕水平从2009年的0.0821上升至2019年的0.1202,年均增幅3.88%。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均值水平最高(0.1195),增幅最小(年均增幅2.11%)。中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1087),年均增幅居中(年均增幅3.52%)。西部地区均值水平居中(0.0913),增幅最大(年均增幅5.56%)。从各省的情况来看,生活富裕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北京(0.1373)、天津(0.1360)、浙江(0.1226)。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更高。后三位分别是青海(0.0936)、宁夏(0.0975)、新疆(0.0961)。这些地区都属于西部偏远落后地区,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相对更低。

## 四、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计算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差异来源。在研究地区差距时,本文按照常用的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法。具体测度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 年份 | 总体差距 | 区域内差距 | | | 区域间差距 | | | 贡献度(%) | | |
|---|---|---|---|---|---|---|---|---|---|---|
| |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东-中 | 东-西 | 中-西 | 区域内差距 | 区域间差距 | 超变密度 |
| 2009 | 0.142 | 0.101 | 0.044 | 0.097 | 0.112 | 0.236 | 0.141 | 20.98 | 76.77 | 2.25 |
| 2010 | 0.129 | 0.084 | 0.037 | 0.084 | 0.100 | 0.218 | 0.133 | 19.51 | 78.48 | 2.01 |
| 2011 | 0.111 | 0.071 | 0.038 | 0.074 | 0.105 | 0.186 | 0.094 | 20.05 | 77.78 | 2.18 |
| 2012 | 0.101 | 0.063 | 0.037 | 0.064 | 0.103 | 0.167 | 0.080 | 19.55 | 77.44 | 3.01 |
| 2013 | 0.106 | 0.070 | 0.025 | 0.064 | 0.113 | 0.179 | 0.074 | 19.05 | 79.28 | 1.68 |
| 2014 | 0.071 | 0.059 | 0.022 | 0.048 | 0.071 | 0.113 | 0.052 | 22.78 | 72.98 | 4.24 |
| 2015 | 0.058 | 0.043 | 0.022 | 0.035 | 0.056 | 0.095 | 0.048 | 20.87 | 75.56 | 3.57 |
| 2016 | 0.052 | 0.049 | 0.018 | 0.037 | 0.054 | 0.078 | 0.036 | 25.12 | 68.20 | 6.68 |
| 2017 | 0.055 | 0.049 | 0.026 | 0.038 | 0.063 | 0.081 | 0.038 | 24.68 | 65.12 | 10.20 |
| 2018 | 0.055 | 0.050 | 0.020 | 0.045 | 0.063 | 0.080 | 0.037 | 25.68 | 64.63 | 9.69 |
| 2019 | 0.063 | 0.054 | 0.025 | 0.063 | 0.058 | 0.089 | 0.051 | 27.71 | 60.18 | 12.11 |
| 均值 | 0.142 | 0.101 | 0.044 | 0.097 | 0.112 | 0.236 | 0.141 | 20.98 | 76.77 | 2.25 |

### (一)总体差距及区域内差距

图1显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基尼系数2012年以前表现为显著的下降趋势,由2005年的0.142下降到2012年的0.101,年均下降率10.76%。2012—2013年有小幅回升,由2012年的0.101回升到2013年的0.106。2013年以后总体基尼系数快速下降,从2013年的0.106下降到2016年的0.052,年均降低了22.51%,之后开始逐渐回升,2019年回升至0.063,年均增长了6.75%。从三大区域内的基尼系数大小来看,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变化速度来看,东部地区年均降速最大,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小。东部区域内基尼系数的变动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9—2012年快速下降,年均下降率为14.48%。之后不断波动中略有下降,年均下降率为2.06%。西部区域内基尼系数在2015年以前呈明显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为15.53%。2015年以后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5.48%。中部区域内的基尼系数在波动中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降低率为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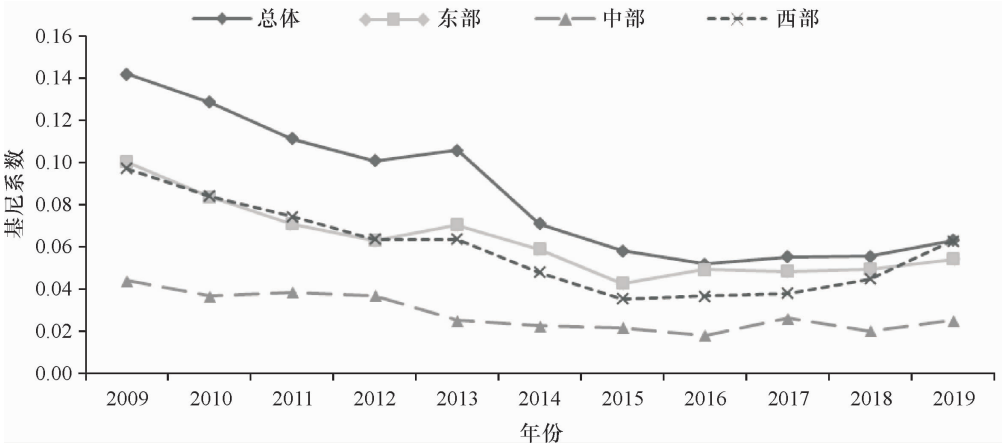



图1 总体及三大区域内差距变动趋势

### (二)区域间差距

图2描述了区域间差距变动趋势。总体来看,东部和西部之间差距最大,东部和中部之间差距居中,中部和西部之间差距最小。东部和西部在2012年以前快速下降,之后小幅度回升后开始大幅下降。东部和中部间差距在2012年以前波动中略有下降,2013—2016年显著下降,之后再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中部和西部间差距在2016年以前持续明显下降,2016年以后有所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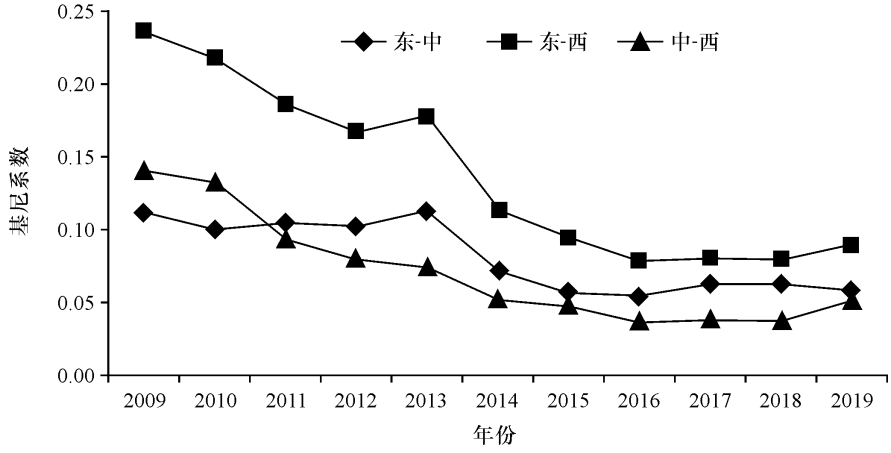



图2 区域间差距变动趋势

### (三)总体差距来源

图 3 描述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距来源。根据图 4,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距贡献率最大的是区域间差距(平均值为 72.40%),其次是区域内差距(平均值为 22.36%),最后是超变密度(平均值为 5.24%)。这说明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虽然 2014 年以来,区域间差距的贡献率已经有明显下降趋势,但仍然是下一步促进中国乡村协调发展的最大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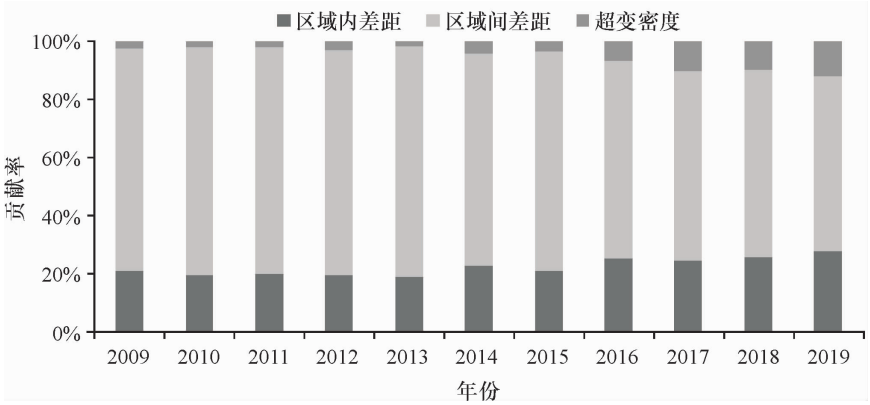



**图 3　总体差距来源**

## 五、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

本文分别选取 2009 年、2014 年、2019 年 3 个年度作为观测对象,绘制了其 Kernel 核密度估计分布图。中国整体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具体见表 4 和图 4。

**表 4　中国整体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

| 区域 | 分布位置 | 主峰高度及形态 | 分布延展性 | 波峰数量 |
|---|---|---|---|---|
| 全国 | 逐渐右移 | 逐渐上升,平缓变陡峭 | 宽度变窄,右拖尾变左拖尾 | 单峰为主 |
| 东部地区 | 逐渐右移 | 逐渐上升,平缓变陡峭 | 宽度变窄,右拖尾变对称 | 单峰为主 |
| 中部地区 | 逐渐右移 | 先上升后下降,形态变化不明显 | 宽度变窄,左拖尾变右拖尾 | 双峰到单峰 |
| 西部地区 | 逐渐右移 | 逐渐上升,平缓变陡峭 | 宽度变窄,对称变左拖尾 | 单峰到双峰 |

### (一)中国整体乡村振兴水平动态演进情况

图 4 展示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核密度分布。可以看出显示,2009—2019 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偏移,偏移幅度较大,说明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考察期间内,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逐渐变高,波峰宽度逐渐变窄,核密度分布的右拖尾逐渐缩小之后表现为明显的左拖尾现象,说明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总体来说,发展高水平省份逐渐减少,低水平的省份逐渐增多,导致到了 2019 年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发展较落后的省份形成较大的差距。考察期间内核密度曲线主要表现为单峰分布,说明中国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极化现象不明显。

### (二)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情况

就东部地区来看,2009—2019 年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偏移,偏移幅度较大,说明考察期间内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逐渐变高,波峰宽度逐渐变窄,核密度分布的右拖尾逐渐缩小之后表现为对称分布,说明东部地区内乡村振兴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总体来说,发展高水平省份逐渐减少,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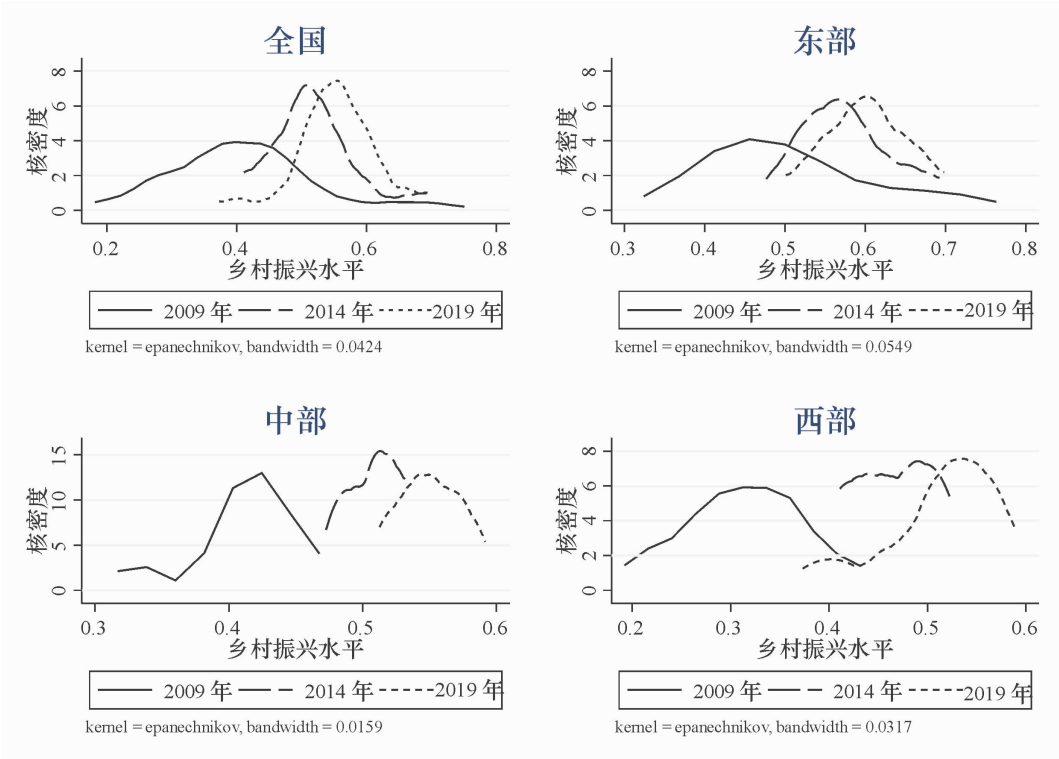



**图4 全国及三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核密度分布图**

的省份逐渐增多，导致到了2019年区域内各省份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均衡。考察期间内核密度曲线表现为单峰分布，说明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就中部地区来看，2009—2019年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偏移，偏移幅度较大，说明考察期间内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中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先变高后下降，波峰宽度逐渐变窄后略有拓宽，核密度分布的左拖尾明显减小，到2019年表现出右拖尾现象，说明中部地区内发展低水平省份逐渐减少，发展高水平的省份不断增多，从而到2019年高水平省份与低水平省份形成一定的差距。考察期间内核密度曲线由明显的双峰分布到2019年表现为单峰分布，说明中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在考察期间内两极分化现象有所改善。

就西部地区来看，2009—2019年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偏移，偏移幅度较大，说明考察期间内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逐渐变高，波峰宽度逐渐变窄，左拖尾增加明显。说明西部地区内乡村振兴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发展低水平省份逐渐增加，与发展高水平省份形成明显差距。考察期间内核密度曲线由明显的单峰分布到2014年、2019年出现双峰分布，说明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在考察期间内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出中国30个省2009—2019年的乡村振兴水平，使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探讨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并分析了差距来源。在此基础上，使用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均值的前三位分别是北京(0.6697)、海南(0.6058)、江苏(0.6023),均为东部省份。后三位分别是四川(0.4002)、贵州(0.3876)、青海(0.3871),均为西部省份。除乡风文明维度水平有所降低外,其他维度水平均呈明显增长趋势。

第二,Dagum 基尼系数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逐渐减小,区域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更加协调。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西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区域间的差距来看,东 - 西间差距最大,东 - 中间差距居中,中 - 西间差距最小。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区域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逐渐减小,区域内差距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逐渐增加。

第三,从中国整体的动态演进来看,全国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表现出明显的“单峰”分布特征,不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从三大区域来看,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区域差距明显减小。东部地区始终表现为明显的“单峰”分布;中部地区经历了由“双峰”再到“单峰”分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由“单峰”向“双峰”分布的转变,两极分化逐渐突出。

尽管十余年来中国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但不同区域之间的乡村振兴水平有较大差异,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差距。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水平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区域间差距仍然是总体差距的重要来源。各地方政府必须把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目标协调推进,同时必须重点解决区域间的核心矛盾,加强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结合区域的实际特点,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推动策略,构建合理有序的乡村振兴空间格局。重点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着力解决区域间差距的核心矛盾,促进全国整体实现乡村振兴协调推进。各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推动乡村振兴作为一项贯彻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政绩考核项目。从国家层面应该加强宏观的政策调整,对于乡村振兴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应该进一步引导和规划,加强对乡村振兴的政策统筹和支持。优化乡村振兴水平落后地区的人才和财政支持力度,积极优化其乡村振兴的环境。继续加强对落后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的精准帮扶,通过干部挂职等方式促进其落后地区乡村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的产业模式,同时给予适当的财政资金投入的倾斜。加强区域间的交流和互动,特别是发挥东部地区等乡村振兴高水平省份的优势带头作用,加强高水平省份与低水平省份的沟通交流,通过点对点的实行培训交流、项目合作、经验成果共享等手段,带动低水平省份发展。

第二,要不断推动乡村振兴系统内部的协同发展。乡村振兴的“20 字方针”涵盖了影响乡村振兴的 5 个方面,同时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五个方面是互相作用的关系,必须促进彼此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有针对性的攻破薄弱环节来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结合中西部地区的特点,提高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率,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促进乡村产业的振兴。同时通过培育发展优势产业,推动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等方式促进其经济发展。对于生态文明方面落后的地区,必须要转变发展理念,从上而下制定生态宜居改善方面的政策,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以及生态环境的提升。对于乡风文明落后的地区,要重点加强乡村人口文明建设,强化文化的传播,提高教育的覆盖率。对于乡村治理落后的地区,要重点通过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治理。对于生活富裕方面落后的地区,重点要以提升农民收入为核心,通过财政资金向“三农”领域的倾斜、加强金融配套措施的扶持、发展数字经济带动农村人口创收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城乡共

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周.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韩屹、实施策略和预期变化[J]. 求索,2018(2):44－50.
[2]金筱萍,陈珉希.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明的价值发现与重构[J]. 农村经济,2018(7):9－15.
[3]杨阿维,李昕,叶晓芳. 西藏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85－193.
[4]佘茂艳,王元地. 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1(13):84－88.
[5]张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8(8):99－105.
[6]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2019(6):90－103.
[7]毛锦凰.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7－58.
[8]卢阳春,石砥. 四川藏区乡村振兴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研究[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4):35－47＋153－154.
[9]陈秧分,黄修杰,王丽娟.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6):201－209.
[10]贾晋,李雪峰,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2018(11):70－82.
[11]李刚,李双元,平健硕. 基于改进熵值 TOPSIS 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青海省乡村振兴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5):8.
[12]阮文彪. 乡村振兴中国模式及政府作为 [J]. 现代经济探讨,2018(6):95－100.
[13]郑庆杰,刘欢.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流动精英与公共参与—基于 H 省 R 县河村的分析 [J]. 山东社会科学,2018(11):73－81.
[14]霍军亮,吴春梅.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69－77.
[15]陈涛,徐其龙.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北京市 Z 村为例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 73－77＋149.
[16]剧宇宏. 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与乡村振兴[J]. 河南社会科学,2018(2):8－13.
[17]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2018(10): 1837－1849.
[18]丁国民,龙圣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障碍与破解[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9－50.
[19]刘祖云,王丹.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技术支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8－16＋156.
[20]廖茂林,杜亭亭,伍世代. 要素结构、技术效率与乡村振兴[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182－187.
[21]章军杰. 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基于梅家坞村的调查研究[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4):118－128.
[22]赵德起,丁义文. 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12－120.
[23]张红宇. 乡村振兴与制度创新[J]. 农村经济,2018(3):1－4.
[24]刘守英,熊雪锋.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制度供给[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4):80－96.
[25]胡中应.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 经济问题,2018(5):53－58.
[26]吴光芸.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07(2):36－40.
[27]熊正德,顾晓青,魏唯. 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21(1):63－71.
[28]郝文武. 为了乡村振兴而建设美丽书乡[J]. 教育与经济,2019(2):3－7.

[29]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 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27 - 135.
[30]DAGUM C. A new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4).

#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WANG Qing, LIU Ya-nan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2009 - 2019,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ntropy metho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were used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nd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Research shows that during the inspection period,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s a whole and i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verage level, the east is the largest, the middle is in between, and the west is the small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rizontal growth rate, the west is the fastest, the middle is in between, and the east is the smallest. The overall gap, intra-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gaps all showed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The main source of the overall gap is the inter-regional gap, followed by the intra-regional gap, and finally the hypervariable den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ap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the regional gap in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the eastern region is in the middle, and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small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dynamic evolution, the regional gap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smaller,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gional disparity;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ive governance